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理想 (节本)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英] 约翰·亨利·纽曼 著

徐 辉 顾建新

何曙荣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理想 (节本)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英] 约翰·亨利·纽曼 著

徐 辉 顾建新

何曙荣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理想/(英)纽曼著;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4317-7

I.大... II.①纽...②徐...③顾...④何...
III.高等教育-研究 IV.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946 号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理想(节本)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
徐辉 顾建新 何曙荣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政编码:310006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5 字数 120 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338-4317-7/G·4287

定 价:10.0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苹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较早系统、综合、全面地论述大学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名著。作者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1851年,纽曼应邀出任新创办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1852年,他在都柏林为宣传这所新办的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经修改,再加上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有关大学教育的演讲,合成《大学的理想》一书。本译本根据梅·亚德利编的节本译出,该节本选录了原著中的几篇演讲及其他一些演讲中的精彩章节。

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在他写作《大学的理想》时,构成自由教育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开始发生变革: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宣布人人都应有政治自由;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人人都能从业,且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渐上升,科学知识精英开始取代传统的宗教知识精英成为社会的主导。为了顺应这些变化,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把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但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固守传

统,注重理性培养和性格养成,排斥科学教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大学采取了一条迂回的发展道路,在传统的大学之外建立专门实施科学教育的新大学和学院,出现了所谓的“新大学运动”。这些新大学效仿苏格兰的大学模式,以市场为驱动,具有收费低、入学要求低、不要求学生住校、排斥宗教教育、不注重知识的整体性等特征。这些新大学的产生危及了英国高等教育几百年来形成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传统的英式大学理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以及爱丁堡评论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不断抨击牛津和剑桥的保守和封闭,要求这两所大学进行改革,废止宗教考试,把自然科学成果吸收到大学教育的内容之中,设置自然科学的课程,并建立科学实验室。英国传统的大学理想已岌岌可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纽曼以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全面、综合地对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纽曼把整个论述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他对大学的性质所作的解释,以及他对所有的知识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认识基础之上。他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他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据此,他认为大学的目的是两方面的。首先,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其次,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综合这两方面,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智能力。既然大学应以传授知识、培养理性为己任,那么传授什么知识,如何培养理性便是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大学教育应提供普遍性的知识(具有普通意义

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识(不能把神学排除在大学教授的知识之外),而不是狭隘的专业知识。他所说的知识既包括具体的科学真理,也包括经过抽象、被科学化了的哲学知识。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心智状态和条件”。因此,追求知识必然是一种精神追求,而精神追求的最大目的也在于精神本身。所以,他主张,“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大学只有把哲学知识包括在其传授的知识范畴之内,并且为知识而知识,才能更适于理智培养。在对大学的功能定位上,他明确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分离。既然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就应为传授知识而设,为学生而设,以教学为其惟一功能。对教学功能的强调,实际上意味着纽曼对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的学院制的看重,只是他的谈论重点在知识,因而几乎看不到他对学院制的论述。总之,在他眼里,大学的存在既不是为了使人变得有学问(非研究性),也不是为了工作作准备(非专业性),也无法使人变得崇高神圣(非道德性),而是为获取知识作准备(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纽曼在第二至第四篇演讲中表明了上述立场。他实际上是在驳斥为中产阶级建立只提供专业教育的世俗大学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依据所有知识构成一个整体,以及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两点,认为大学若不把神学包括在内,不传授普遍知识,那就不能称其为大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纽曼所说的自由教育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自由教育的具体体现,是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等于一身的绅士。为知识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是进行这一教育的重要途径。他反对在大

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用他的话来说,“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掌握的知识越具有特殊性和经验性,那么他就越没有知识,教育就越不是自由的。他运用“好”与“实用”两者的关系,来论证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用的并不总是好的,但好的却必定是实用的。”由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理智培养,而“理智培养本身是好事,并且是其自身的目的”,因而也是一种实用的教育。尽管“实用”与“好”分属于工具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概念,但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不矛盾,因为自由教育培养的人有能力马上从事相关的科学和专业工作。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虽不以追求功利和实用为目的,但并不否认其功利性和实用性,是对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有力反驳。纽曼在第五至第八篇中主要讨论了自由教育的性质及其功利、实用的一面。

为了实现这种自由教育,除了必须坚持为知识而知识的原则外,他主张学生“应真实主动地进入知识领域,拥抱它,掌握它。思维必须行动起来,半道迎接迎面而来的事实,……你不是仅仅来听讲座或读书的,你是为了问答教学而来的。这种教学存在于你与教师之间的对话中”。他的理想大学中的学生,不仅要主动、积极、开放、交互式地进行学习,还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去掌握知识。他主张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分析、分类、对照、协调、匹配、整合等手段,使新知识真正内化为学生整个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学生的才智增长。由于学生“不可能攻读每一门向他开放的学科”,为了实现大学应提供普遍的与完整的知识的教学目标,他主张使大学成为“教育场所”而不是“教学场所”,也即让学

生生活在“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人之间”，强调学生在一种洋溢着普遍知识的益智团体氛围中进行自我教育。

纽曼曾在牛津生活了二十余年。牛津的精髓——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构成了他的大学理想的重要内容。此外，他的宗教生涯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大学理想。纽曼曾是英国国教徒，后于1845年皈依罗马天主教。他对当时新兴的大学和学院把神学排斥在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在前言中指出，大学相对于教会是独立的。但如果离开了教会的帮助，大学就不能充分地完成其目的，因为教会对实现大学的完整性是必要的，神学作为宗教真理应是这种完整的知识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的介入非但不会改变大学的特征，反倒会使大学在履行其智育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得更稳健。在第九篇演讲中，纽曼讨论了宗教对大学的责任，认为大学为实现其目的就应接受宗教的道德影响，他还讨论了应如何恰当地施加这些影响。这里，纽曼虽然过分强调了宗教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以及神学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作用，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大学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当他意识到教皇任命他为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只不过是让他把大学变成一座受到精心保护的天主教温室时，他毅然辞去了校长职务。

纽曼充满激情、合乎逻辑的雄辩没有挽救英式传统大学理想的命运。一方面，纽曼的大学理想本身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在大学职能方面，他主张把科学研究排斥在大学之外，没有看到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积极一面，从而未能像洪堡那样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作出较为全面和积极的评价。在大学如何处理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上，纽曼完全站在自由教育的立场上，而没有结合专业教育本身进行综

合考虑,忽视了发展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未能对科学革命作出积极的反应;即使就自由教育本身而言,他也十分看重古典学科,特别是文学(本节本的最后一章即是关于文学的)的学习,把自由教育严格地限制在理智培养上,而把美德的培养排斥在外(在他看来,良知与美德只能来自宗教)。在对大学的制约因素方面,他夸大了教会的影响,忽视政府的作用及与社会的联系。在方法论上,纽曼的许多教育思想以假设为起点,他对“大学”一词的可能的词源学解释构成了他立论的基础,对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的论述建立在“理智培养本身是好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直接影响了其思想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纽曼写作《大学的理想》的时候,高等教育的世俗化与专业化已是大势所趋;加之,新的大学理想已在德国形成,且被广为效法,对此,纽曼并不是不知道。他的大学理想只能在传统、现实与希望这三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纽曼的大学理想涉及大学的性质、目的、功能,大学教育的原则、方法和内容,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大学与教会的关系,等等。他的大学理想是一种代表了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大学理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如此,他的大学理想才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以至《大学的理想》在出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经过八百多年的发展,大学已走出“象牙塔”,从一种社会边缘机构演变成一种社会轴心机构,成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深刻的危机、冲突和矛盾。我们今天译介《大学的理想》,也正是希望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在考虑解决这些危机、冲突和矛盾时,能

从这本不乏深刻见解的著作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纽曼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雄辩之士之一,其艰涩难懂的神学语言更是给《大学的理想》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困难。因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斧正。

徐辉、顾建新

2001年11月1日

序

事情的缘起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高等教育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牛津及剑桥也许保留了其社会及宗教方面的排外性。伦敦、曼彻斯特及达勒姆等地创办了自己的新大学,虽然确实没有得到伟大传统的启示,却相应摆脱了传统的桎梏。为工人阶级提供继续教育的机械学院,在许多中部城镇迅速崛起,并且即使是毛礼斯^①及社会党人的时代尚未来临,但为这项工作效力的讲师已不乏其人。实用知识普及协会的影响力正值鼎盛时期,各类提供娱乐及实用信息的廉价书籍充斥于世,公共阅览室在各大城市里应运而生。为了使中下阶层人民的高级教育变得有吸引力、实用而富有成效,人们可谓竭尽所能。

理论要么与实践同步,要么紧随实践的步伐。但除斯宾塞外,其他理论家对当时的这类新兴机构极少感到满意。许

^① 毛礼斯·威廉,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及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多作家,如惠韦尔、纽曼、帕蒂森、阿诺德、西莱等,都曾在老邦大学里接受教育。现代教育机构宣称要提供大学层次的教育的那些主张,迫使他们去审视隐藏在教育他们的方法背后的教育原则,并且拿它们与新的原则作比较,结果多半会使后者黯然失色。他们新的大学教学方法中发现了不少弊端,在其内在的哲学基础中找到了不少谬误。伦敦大学在课程的广度上采用德国模式,在教学方法上效仿苏格兰,采用完全的讲课制,使自己暴露无遗地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嘲讽,说这好比是“某种集市,各货摊之间互不相干,各自兜售堆在一起的各种货品”^①。同样,那些机械学院给人的感觉是,通过举办一些内容涉及令人感兴趣的学科的半科学性质的讲座之类的项目来普及许多学科的肤浅知识,但是以牺牲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为代价。“一切东西必须从速学到手……印刷机之于头脑,就如蒸汽机之于物料。”^②实用知识普及协会用许多半科学性质的书籍,使公众的头脑得到娱乐甚至信息,但“娱乐不等于教育”。

实用是新型教育的座右铭,正如实用曾是20世纪早期爱丁堡评论派对老式大学的课程进行抨击的口号(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对这一抨击作了勇敢的说明)。边沁学派的哲学思想进而支持了这种新型科学学校的专业兴趣。对“实用”教育的需求,引起了人们对公立学校的大部分呆板的古典课程的关注,其益处过去是,现在仍还是不及把实用狭隘地理解为强调专业教育,这使得大部分针对初等教育及大学的批评无说

① 帕蒂森:《牛津研究》,1855年。

② 纽曼:《大学的理想》第六篇。

服力可言。而且,在新大学里,学生不住校——这对于毕业于牛津的学生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校园生活比课堂教学更有价值。牛津与剑桥最近才意识到考试是不可避免的弊端,但考试预示了要主导新大学各课程,以至惠韦尔提出告诫,“考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一点应始终牢记在心”^①。这些仅仅是新型高等教育最突出的不足,批评家攻击他们并不是或很少是出于吹毛求疵,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把高等教育带给民众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以牺牲教育本身为代价。

约翰·亨利·纽曼曾担任牛津大学的指导教师。他是教育世界里一个有心的观察者,因为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教育的位置仅次于神学。若不是有人要求他专门去抨击这些不足,他就不会像在《关于塔姆沃思阅览室的信》(*Letter on the Tamworth Reading Room*)中那样偶发一些非难之辞,因为他没有马克·帕蒂森的那种甚至对火车时刻表也会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改革热情。在纽曼及其他许多人的头脑里,这种新型机构的任何其他不足都不及另一不足更为根本,那就是世俗教育的弊端。他在这一方面的抨击言论反映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这是他1852年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时发表的系列演讲。我们有必要仔细考虑该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

20世纪初以来,初等教育有一个特征,就是充满宗教争论,但迄今为止这还不是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原因很简单,除了英国国教外,高等教育置其他的宗教团体于不顾。直到

^① 惠韦尔:《论英国大学教育的原则》,1837年。

1850年政府改革之前，牛津及剑桥仍维护宗教的排外性。1827年，新创办于伦敦的大学学院，不仅无需通过宗教考试就向所有的求学者敞开大门，而且试图满足英国国教及非国教两方面的支持者，而全然把神学抛在一边。“高韦尔大街上的无神学院”很快成为各地效仿的样板，因为这等于为“综合教育”(mixed education)^①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提供了最简便的解决办法。1845年，政府在爱尔兰的三个主要城镇创办了非宗教性质的皇后学院，信奉天主教及新教的人均可自由入读。但综合教育的原则却遭到天主教会的谴责，这恐怕不仅仅是出于对要失去对年轻一代天主教徒的控制的无以名状的担心，因为当宗教与科学之争开始时，世俗学院即便不是“无神”，很快也会变得可以自由思想。纽曼1845年皈依天主教，但他并没有天主教会综合教育的那种担心，因为他确信：“大学理应来者不拒，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妥协，只要他们是冲着真理而来。”^②但他的确与英国国教及天主教具有宗教头脑的人士持有同样的疑虑，那就是把神学全然抛在一边，就等于蔑视了其价值，并终将以一种“伪自由主义”的眼光滋长对神学的怀疑态度。

1852年，教皇颁布训令，在都柏林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只为天主教徒提供教育。该大学包容大学工作的方方面面，并且设了神学教授职位，享有与其他教授同等的地位。纽曼受邀从伯明翰的小礼拜堂来到都柏林，担任该大学的校长。这

① 指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混杂在一起而进行的教育，并且把神学与宗教训练排除在课程内容之外。——译者注

② 纽曼：《关于基督教与科学调查的演讲》，1855年。